



大學館

劉龍心◎著

學術與制度

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劉龍心◎著

大學館

學術與制度

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遠流出版公司

Academy and Institution:

The Disciplinary Process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Long-hsin Liu

Copyright © 2002 by Long-hsin Liu

Published in 2002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7F-5, 184, Sec. 3, Ding Chou Rd., Taipei, Taiwan

Tel: (886-2) 2365-1212 Fax: (886-2) 2365-7979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學術與制度

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作者／劉龍心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2365-1212

傳真／2365-7979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靈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140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2年2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新台幣售價 42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545-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劉龍心著． -- 初版．-- 臺北市：遠流，

2002[民 91]

面；公分． -- （大學館：49）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32-4545-0（平裝）

1. 史學 - 中國 - 現代 (1900-) 2. 歷史
- 教育

601.9208

91000333

自序

坦白說，八年前當我剛剛開始構思這個問題的時候，除了少數師長及朋友之外，並不太多人知道我究竟想做些什麼。長久以來，史學界一直流行一種看法：史學研究與歷史教育是兩碼子的事。雖然，我一直很清楚地知道這兩者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互饋」的關係，而我也非常想從史學史的眼光重新看待這兩個「範疇」，但怎麼著手，還很茫然。

直到四年前（1997年）暑假，帶著一份極不成熟的撰寫大綱，隻身前往大陸找資料。一個半月裡身陷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圖書館，載回兩箱超重的行囊，滿滿的資料堆疊出我更大的疑惑。

只是這個時候我的疑惑已經不再是怎麼著手，而是如何消化這些材料並且建構這麼一個龐大的問題。慢慢地，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我開始把焦點集中到「類別知識」方法的這個角度上，換言之，我發現在近代知識轉型的過程中，類別知識方法的不同導致現代學術無論在分類概念、知識性質和學科界域上，都與傳統學術有著極大的不同。而學科體制的出現，尤其帶動了知識內涵的轉化。

始終相信，任何一種有機的研究或創作，必須照看自己生命的深層內裡才能完成。即使這樣一本疏陋的論文，在日昇日落的一千多個日子裡，反覆出現、一再咀嚼的是自己大學以來的求學歷程：幾度自問在這個學科體制裡我究竟接受了什麼？忽略了什麼？甚至

習慣了什麼？何以類別分科的概念會影響史學內部的分類架構？何以體用對立的思考形態會阻斷學術分科的進行？明明已經建立的制度何以又再復返原型？而傳統知識結構的分化又為什麼與史學學科界域的形成存在著如此密切的關聯？漸漸地，從枯燥無味的制度中，我看到了活躍於制度底層人群的活動與思考，也看到了曾經參與建構體制的人，最終不免也為制度所塑；制度不再是孤懸的條文，也不是乏味的規章，制度背後所顯映的是人們對問題思考的路徑以及對時代所做出的反思。隨著歷史還原的過程，個人經驗不斷地置入與抽離，慢慢發現到原來我所構築、還原的不再只是一個世紀前的歷史，更是自己十數年來的生命歷程。

這是一本由博上論文改寫而成的小書，在寫作的過程中，首先要感謝的是杜維運先生。自 1989 年考進政大碩士班以來，即從杜師論學，從早期所修史學理論與實習、中國史學史專題等課，到後來撰寫碩士論文〈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以至今日的博士論文，杜師非但領我進入史學史研究之門，更引我走向寬廣的學術天地。寫作過程中不論遭遇任何問題，杜師總給我最大的包容與鼓勵，每有小小創獲，杜師也從不吝在文稿上加注密密圈點並為文稱許。12 年來感受尤深的，除了是杜師溫厚謙和的處世風範，更是他對史學研究數十年如一日不減的熱情，即使年逾古稀仍堅守陣營、寫作不輟，讓做為後生小輩的我，時時惕勵不敢或忘。其次要感謝的是王汎森先生，與王先生相識於他在政大的一場演講，此後更多次就此論題就教於他。特別是王先生後來又成了我論文的口試委員，口試當天王先生提出非常多深入而有建設性的意見，予我觀

念與資料上的提點尤多。其間更蒙其引介，認識了四川大學的羅志田先生，並將論文中的一部分刊載在羅先生所編《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一書中，與羅先生書信往返論辯的過程，亦受益良多。

論文口試時，閻沁恆先生、黃福慶先生和林能士先生等諸位師長，也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只是有些意見無法藉此次出版之際一一改正，是我個人要負全責的。多年來，政大優厚的求學環境與師生情誼，給了初入學術之門的我一個十分自在的空間，諸多師長、同學的垂詢與關注，也帶給我許多堅持以往的勇氣，王壽南先生、胡春惠先生、張丕法先生、張哲郎先生、周惠民先生、彭明輝先生，以及牡丹、簡秋慧、吳蕙芳、林蘭芳、潘光哲、陳以愛、陳鴻圖等學友，都是我衷心要感謝的。此外對於沈松僑先生、陳弱水先生、游鑑明女士、張壽安女士、張瑞德先生、張力先生、黃克武先生、盧建榮先生，對本書任何一部分的批評與建議，都在此一併深致謝忱。而華東師範大學的胡逢祥先生、張文建先生和黃愛梅小姐，以及北京圖書館的許進女士、上海圖書館的劉瀾女士，在我赴大陸蒐集資料時提供的協助與幫忙，至今難忘。母親與家人的支持與體諒，更是我漫長求學生涯的最大支柱，兄嫂每週定期的聚會，既是消遣也是論學，人生至樂莫過於此。

本書得以出版，要特別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的主編游奇惠小姐，以及美編夏心婕小姐，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書的出版日程恐怕無法如此順利。

當然最要感謝的，是這五年多來朝夕相伴的先生呂紹理，沒有他的相知與包容，我不可能如此從容無憂的寫作。不論在我意興勃

發，或是頹然消沈的情緒中，他總是用他一慣的樂觀與沈穩，給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數不清幾個夕陽西斜的傍晚，我們牽手走向後山，一邊舒散勞累一天的筋骨，一邊交換一天的思考，或者激辯如潮，或者靜默以對，直到太陽下山，華燈初起，才悠悠回家做飯。如果這本書有任何一點點創見，紹理皆與我分享。全書出版在即，卻還有太多不及改動的論點與缺失，不過一切只能寄諸來日了。

劉龍心 謹誌 2002 年元月

目 錄

自 序	i
第 1 章 緒論	1
第 2 章 學制建立與歷史教育系統化的出現	15
第一節 晚清學堂教育與學科體制的建立	15
第二節 新式學堂與歷史教育的變革	48
第三節 重編國史運動對歷史教育的衝擊	82
第 3 章 新史學與學院化史學之建置	117
第一節 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與史學獨立意識的萌現	117
第二節 從國學研究到專史設科——史學專門化的確立	151
第三節 課程標準化和史學人才的培育	195
第 4 章 學科規訓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專業化	263
第一節 方法論的建立與史學紀律的形成	263
第二節 教學與研究——專業史家資格的評覈與認證	311
第三節 客觀標準與學術環境的追求	349
第 5 章 結論	377
徵引書目	389

第 1 章

緒論

或許在 20 世紀末的今天，一個面臨解構的年代裡，來談一個結構形成的問題似乎顯得有些過時。但是我還是忍不住要問：這個快要被我們解構的結構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做為一個專門記錄別人歷史的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有多少了解？特別是從事現代史學史或學術史研究的我們，又是不是曾經花過一點點時間去回顧一下自己的歷史，並思考一下這個長年供養我們習史、寫史的環境究竟是怎麼形成？怎麼出現的？而這樣的環境，又給了我們什麼影響？什麼訓練？甚至於什麼限制？如果我們必須費力回答這些問題，是不是代表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所知太少？那麼，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寫別人的歷史？

在從事民國史料學派研究的過程中，經常環繞在我心裡的一個問題就是：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民初史家不斷地希望從清代考據學當中去挖掘出現代史學的某些精神與特質？而這些問題除了從學派、人物、思潮、運動或特定機構的角度來觀察之外，¹我是不是能夠從一個更廣闊或更結構性的因素裡去找尋問

¹ 目前台灣及大陸地區有關現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論著中，以學派、思潮和

題的答案？於是我開始留意制度面的發展對中國史學所帶來的影響。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梁啟超在〈新史學〉上的一段話說：「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²而對這段經常為人引述的話，我不禁懷疑如果史學確是中西皆有的一門學科，那麼傳統史學又為什麼還存在如何向現代／西方轉化的問題呢？直到後來，持續從制度史的面向去觀察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之後，我才慢慢體會到原來久處學科體制下的我們，已經很難於梁啟超話語的細微處看出：中國所固有的史學，實際上並不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換句話說，一個世紀以前，當中國知識分子正努力為中西學術會通之道找尋出路時，不會想到 100 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幾乎無法分辨何者為中學，何者為西學；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學科體制」，不但主宰了 20 世紀學術發展的主要形式，同時也徹底摧毀了我們對傳統知識結構的認知，以致身處 20 世紀末的我們，往往不自覺地就會以「學科」的角度來理解史學這門古老的「學問」。

事實上「學科」這個名詞，是清末採行學堂分科教育以後才逐漸由西方引進的一種知識分類概念，在定義上，它具有學術領域、課程、紀律、嚴格的訓練、規範、準則、約束以至薰陶等多重含義，³在中文裡沒有完全相對應的字眼可以涵蓋。透過新式教育的推廣，

運動、人物為取徑的研究所占比例最高。詳見：劉龍心，〈七十年來對於「現代中國史學史」（1902-1949）的研究回顧與評析〉，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第 1 冊（台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 12 月），頁 1051-1088。

²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 4 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72 年 12 月），頁 1。

³ J.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e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這種以知識性質做為分類標準的學科概念，非但正式成為近代教育體制中分門畫界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構成了 20 世紀學術發展的基本架構。⁴因此如果我們企圖從制度面的角度，去觀察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問題時，絕不可能忽略學科體制對它所產生的影響，其中以學院為基礎建置的大學，更是形塑整個學科體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環，不以大學為觀察基點，無以說明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過程。

放眼西方學術界對於學科問題的討論可謂十分豐碩，除了一些綜論大學體制與學術專業化的論著之外，⁵也有不少關於個別學科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ume 4, pp.574-575.

⁴ 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認為 19 世紀後半葉 (約在 1850-1914 年間)，西方國家基本上透過三種方法把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加以制度化：一、大學以學科名稱設立科系；二、成立國家學者機構；三、圖書館開始以這些學科做為書籍分類的系統。見：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鑑學派〉，收入：華勒斯坦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力》(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 3 月)，頁 213-214。有關此一課題，華勒斯坦另有一書專門討論 19 世紀以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典範建立的侷限性。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7-22, 185-226.

⁵ 例如瑞典學者 Bjorn Wittrock 等人，就曾針對 19 世紀以來歐洲和美國的大學，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過程提出觀察。他們大多認為 19 世紀以後的大學，無不必須面對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建構之後的挑戰，而專業化的趨勢以及以研究為導向的大學教育，又逐漸成為 20 世紀的主流。見：Rolf Torstendahl,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oger Geiger, "Research,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Ecology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jorn Wittrock,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以上三篇論文俱收入：Sheldon

研究，⁶就以史學這門學科而言，專論法國、美國史學專業化的代表作就有好幾種。例如 William R. Keyler 的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就是探討 1870 年到 1914 年間，法國史學在大學中逐漸形成一門學科的過程。⁷作者認為法國史學在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過程中，由於教育體制接近中央集權的特性，所以使得一些具有主導力的史學家們，不僅在史學界或學院內部能夠發揮其影響力，就連對中小學教育的發展方向和教學方法上，他們亦多所獻替。特別是在 1870 年以後，訓練人才的機構幾乎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學，以致學科之間的互動程度遠較美國或德國來得更為緊密，而這個特色不但有助於他們建立嚴密的專業紀律和規範，同時也是促使法國史學界更為重視方法論探討主因。⁸其次，像是

Rothblatt and Bjorn Wittrock ed.,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⁶ 西方著作在談到專業化的問題時，最常以法律、醫學等特別需要專業技術的學科，做為探討對象。例如 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⁷ William R. Keyle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⁸ William R. Keyler 認為由於法國學術界之間的集中性與互動性較強，所以在史學開始進入學院體制之後，法國史家便希望藉著方法論的探討，以釐清史學與哲學、文學之間的界線。其中又以朗格羅瓦 (Charles V. Langlois) 和塞諾波 (Charles Seignobos) 為代表人物。見：William R. Keyle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pp.5-6; 75-89.

Theodore S. Hamerow 的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⁹則是一部專門討論美國史學專業化的作品。作者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史學愈趨沒落的現象十分憂心，他認為這個現象絕對與史學本身的專業化有關，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危機，他重新回過頭來檢討史學這個「專業」的本質，以及它如何走向專業化的過程。作者指出：美國史學的專業化，基本上與大學體制的建立、中學教師需求量的增大，以及自然科學專業分工的影響，和各種慈善基金會的挹注都有密切的關係。反觀這些特點，雖然未必都能一一套用在中國史學專業化的進程中，但是作者針對史學專業化所做的反思，確是全球化現象出現以後，中國史學界不能不注意的問題。

再者，Peter Novick 所著之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一書，¹⁰則是討論「客觀」概念何以會成為 100 年來美國專業史學界最重要的一項學術資產，並且分析此一概念如何產生，如何修正，又如何遭到質疑和挑戰，以及如何回應等問題。作者認為史學專業化的目的其實就在建立一套客觀的標準，而專業化與客觀化的要求乃一體之兩面。美國史學界自 19 世紀末受到德國蘭克學說的影響開始，即分別透過教學活動或是各種社會組織形式以達成客觀化的要求。這個要求使得史學逐漸脫離業餘者的角色，並得以躋身學院之林。然而歐戰爆發，卻為美國史學界的「客觀精神」投下變數，過去那些深受德國史學濡染的學者，不得

⁹ Theodore S. Hamerow,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7.

¹⁰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不重新思考如何面對戰爭中的「德國敵人」。基於美國史學界親身遭遇的實例，Peter Novick 強調：客觀不能只是做為一種抽象概念來談，更要注意史學家在現實社會中的種種遭遇與挑戰，因為這些際遇都會回過頭來質疑客觀性成立的基礎。

藉由 Peter Novick 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歷史情境，不但會出現不同的「客觀」標準，同時也會產生不同的專業組織特性，因此某一國家史學專業化的經驗，往往不能遽以為其他國家專業化的判準。就如 Charles E. McClelland 認為「專業」一詞所包含的九大特質，¹¹未必全然適用於所有國家；英美等國自由結社的傳統與德國政府部門的力量，分別造就英美與德國專業化不同的特性。¹²同樣地，中國史學專業化的過程，也絕不完全等同於其他歐美國家的經驗。著重體會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情境，將是本文撰寫的主要目標。

¹¹ McClelland 指出德國社會科學對於「專業」一詞所包含的特質及定義為：(1)高度專門化及進階的教育訓練；(2)擁有共同遵守的規範及倫理；(3)強調利他主義及服務公眾的精神；(4)必須通過各種激烈的測驗、檢覈及認證（license）過程；(5)具高度的社會威望；(6)高收入；(7)職業升遷有固定的模式或階層（occupational career pattern or ladder）；(8)就業市場具獨占性；(9)自主性。參見：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p.14.

¹² McClelland 認為：英、美兩國較具自由結社的傳統，因而像律師這種職業，在專業化的過程中會特別強調律師公會的獨立自主性，但是像德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政府部門的力量高過一切，所以職業市場的獨占性反而是造就德國法學專業化的重要特質。參見：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pp.11-27.

此外，大陸方面近年曾經將美國史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所寫有關學科體制的單篇論文集譯成書。其中沙姆韋（David R. Shumway）和梅瑟·達維多（Ellen Messer-Davidow）二人所撰〈學科規訓制度導論〉和霍斯金（Keith W. Hoskin）的〈教育與學科規訓制度的緣起：意想不到的逆轉〉二文，對於本文在觀念上的澄清甚有幫助。〈學科規訓制度導論〉一文，著重從字源意義上去分析「學科規訓」制度所代表的知識和權力兩種含義，並且追溯西方學科制度生成的歷史。¹³而霍斯金的論文則強調：所有新興知識門類的出現，其實都是教育形式改變之後所帶來的結果，換言之，18世紀以後出現的三種新的教育實踐方式——考試、書寫、評分，不但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法，以及執教者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因為教學雙方都必須同時面對經常性的監視和評斷，以致逐漸衍生出一種自我規訓的力量。¹⁴

相較於西方史家對學科問題關注的程度，中文著作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顯然相當不足，¹⁵特別是以歷史學為核心的探討更是付之闕如。

¹³ 沙姆韋（David R. Shumway）、梅瑟·達維多（Ellen Messer-Davidow），〈學科規訓制度導論〉，收入：華勒斯坦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力》（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3月），頁12-42。

¹⁴ 霍斯金（Keith W. Hoskin），〈教育與學科規訓制度的緣起：意想不到的逆轉〉，收入：華勒斯坦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力》，頁43-84。

¹⁵ 十幾年前金耀基曾經集錄一冊以大學為核心的短篇論文集，勉強可以視為有關學科體制的討論。而大陸地區，近年則有《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一書，以教育制度史的方式，介紹清末壬寅、癸卯學制以降，以至1922年所頒布的壬戌學制之間的比較與分析。見：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

20 年前汪榮祖在一篇名為〈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的論文中，提到中國史學的「近代化」，乃是奠定在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三個基礎之上。學院化的結果一方面使得史學逐漸擺脫政教附庸或貴族餘興的地位，一方面則促進了專業化時代的來臨，歷史研究開始由專人負責，並且漸漸成爲一種精細的「科學研究報告」。至此，史學才隨著近代學術獨立的潮流以及客觀原則的要求，正式成爲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¹⁶這篇文章成文的時間很早，可惜沒有進一步詳細的論述，但文中所提學院化、專業化和獨立化等三大指標，對於思考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之間的關係極具啓發性。

除此之外，到目前爲止，在已知的研究撰著中並沒有直接相關的論述出現，而與此一主題較為切近的研究形態，則通常以描述大中小學歷史教育的方式呈現。例如鄭之書的〈清末民初的歷史教育（1902-1917）〉，便是以課程規畫、教師來源和教本內容分析等三個方向，縷述清末民初各級學校施行歷史教育的狀況。¹⁷而大陸方面，華東師範大學胡逢祥、張文建二人所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一書，立有一節專論清末《奏定學堂章程》對大中小學堂歷史課程的規畫，以及 20 世紀初因應新式教育而出現的各種歷史教科書。¹⁸其他如彭小甫

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2 年 9 月）。錢曼倩、金林祥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¹⁶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收入：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8 年 5 月），頁 221-233。

¹⁷ 鄭之書，〈清末民初的歷史教育（1902-1917）〉（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刊稿，民國 80 年 6 月）。

¹⁸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 9 月），頁 256-271。在此之前張文建曾單獨發表過一篇〈清